

杏壇與文壇 —— 清末民初女性在傳統與 現代抉擇情境下的教育與文學志業

胡 曉 真*

摘 要

本文通過報刊雜誌資料，探索 20 世紀初期，受過傳統教育的女性在跨越清末民初之際，如何站在教育者的崗位，嘗試結合婦女教育與新的創作型態及發表模式。

本文涉及的三個個案 —— 劉璣、祝宗梁與施淑儀，都活躍於 1910 時期的教育界，她們對教育者的定位與責任的認知，以及對文字創作的理解，又於同中有異。她們的言行有助我們觀察 20 世紀初中國傳統女性依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如何塑造新時代中自我的身影。本文論述以劉璣為中心，以祝宗梁為輔，最後以施淑儀作襯照。劉璣與祝宗梁合力開創黑龍江女學，此一期間，她們以母教楷模與女子教育前驅者的形象，在刊物上發表諸多女學論述，而皆以傳統儒家為依歸。另一方面，施淑儀在喪夫喪子之後，傾其所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有於故鄉崇明島建立女校，同時也以女教育家的身份在刊物上密集發表作品，更以剪髮、遊行、學作新體詩等行動，建立鮮明的形象。因此，施淑儀的自我定位是一個覺悟者，棄絕傳統女性典範，邁向未來。同樣橫跨杏壇與文壇，這三個個案於 20 世紀初期的女性教育問題上，展現不同的視野，為我們提供女性的觀點以理解當時所謂「女學」，更提醒吾人不應簡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分野。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三位女性在刊物上發表的文字都以議論文為主，不同於明清女性文藝以韻文為中心的傳統。這個現象指向女性書寫與表達模式在 20 世紀初發生的轉變，也關涉學校國文訓練所創下的新教育典範。

關鍵詞：婦女教育、婦女雜誌、中華婦女界、劉璣、祝宗梁、施淑儀

近年來，不少中國近代史與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者開始討論一個看似單純而其實相當複雜的問題：傳統文藝才女的形象在 20 世紀初期如何受到衝擊並重新詮釋？¹ 再者，在所謂「新女性」的形象正式建立以前，傳統才女是否曾試圖與時俱進而調整自己？她們採取什麼方式？我在探索相關問題的時候，發現這是非常個人性的過程，也就是同樣被歸類為最後一代的傳統才女，不同的女性所面對的情況其實不同，所作的生命選擇也可能不同。事實上，所謂傳統文人在同一時期也經歷轉化以及自

1 相關討論如 Ellen Widmer,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an Writer,"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93-225; Joan Judge,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 3 (June 2001), pp. 765-803;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胡曉真, 〈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69-193。

我轉化，在這個層次上，這是個跨性別的問題。不難注意到，20世紀初期的中國作家不少人從事教育工作。不論是五四健將，還是鴛鴦家數，我們所熟知的諸多名家，在作家的身份之外，往往也是各級學校的教員，文壇與杏壇因此有許多匯集交點。傳統才女在踏入現代情境時，也有類似的情況。也就是說，某些受過傳統教育的女性在跨越清末民初之際，站在教育者的崗位，嘗試結合婦女教育與新的書寫方式及發表模式。女校與報刊雜誌於是成為這些女性發聲的新場域。本文將以三位女性為個案進行討論，她們基本上代表兩種不同的典型，但是又受到各種個人因素的影響而各有特色。她們有許多共通點，例如都以婦女教育為職業（以及志業），也都熱心投入新式的文字媒體。她們也有明顯的差異，例如對傳統道德與行為規範的態度，或是對新興潮流的看法。然而，若遽以保守相對於激進來定義兩者之間的差別，卻顯然未見真章。理解這兩種典型，同時觀察典型中個人特質的差異性，有助我們觀察20世紀初中國女性如何由傳統出發，而塑造新時代中自我的身影。

本文處理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劉璣，即林傳甲（1877-1922）之母；並順帶論及祝宗梁，林傳甲之妻，亦即劉璣之媳。眾所周知，林傳甲於1904年編寫《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被視為第一部本土的中國文學史。約當同時，他的母親劉璣也致力於女子教育，而且編有婦女文學史作為教材。離開京師大學堂後，林傳甲先到廣西，然後奉派到黑龍江創辦教育，母親劉璣與妻子祝宗梁隨行，並且合力開辦黑龍江女學。此一期間，她們以母教楷模與女子教育前驅者的形象，在刊物上發表諸多女學論述的作品。劉璣與祝宗梁在婦女教育上倡導實用價值與傳統道德，然而她們本人的姿態卻非常強勢，自覺而刻意地散發非傳統的豪壯之氣。作為另一種生命型態的襯照，我提出的第三個個案是施淑儀，亦即《清代閨閣詩人徵略》的編纂者。出身崇明島的施淑儀在喪夫喪子之後，傾其所有於故鄉建立女校。與劉璣一樣，施淑儀以女教育家的身份在刊物上密集發表作品。她更以剪髮、遊行、赴北京參加講習會以學習「國語」、學作新體詩等行動，建立鮮明的形象。因此，施淑儀的自我定位與自我表達與劉璣與祝宗梁不同，她所塑造的形象是一個覺悟者，棄絕傳統女性

典範，邁向未來。今天我們要接觸這三位 20 世紀初女性的生命經驗，最直接的管道便是透過她們發表作品的刊物。這三位接受傳統教育而投身新式教育的女性，不約而同地利用新的雜誌媒體，熱切地建立並且宣揚她們的自我形象。

「此種老嫗」—— 劉璣的報刊言論與教育志業

劉璣，字邦媛，四川人，生於武將的官宦家庭。太平天國戰役中，她的父親劉長清在廣西提督任上過世，所以她是由母親教育長大的。劉長清雖是武將，但工書能詩，劉璣受的也是傳統閨秀教育。² 劉璣婚於福建林氏，34 歲時守寡，之後便獨力撫育三名失怙孤兒成人。³ 她的長子便是林傳甲。林傳甲籍貫福建，畢業於西湖書院，在 1900 年以前，不過二十出頭，便創辦了好幾所學堂，包括湖北時務學堂 (1896)、衡州時務學堂 (1897)、常寧時務學堂 (1898)，據說頗受張之洞器重。之後林傳甲又受聘到湖南任教。他於 1902 年回籍考中第一名舉人，1904 年經由嚴復的推薦，獲聘到京師大學堂擔任國文教師。⁴ 便在此時，林傳甲爲了

-
- 2 劉璣在《婦女雜誌》創刊號 (1915 年 1 月) 發表其《林下詩存》四首，編者王蘊章附記：「作者為故提督公長清之淑女」。這應是可靠的資料。有關黑龍江教育的研究一定會討論到林傳甲及劉璣，但劉璣的確切背景，此前尚未經學者提出。據《清史稿·文宗本紀》，洪秀全撲全州，進撲永州，檄提督鮑起豹、劉長清分禦之。據杜貴墀，《巴陵人物志》，太平軍起，劉長清督川兵進剿，旋署廣西提督，專辦北路。後於咸豐三年 (1853) 在兩江總督陸建瀛麾下，因未能乘勢進攻而遭嚴旨褫逮，旋卒。據此一資料，劉長清長女名媛，精算術，著有《林下詩存》，即劉璣也。本資料又稱她是「林文忠公孫婦」，不知何據，或者其夫確為林則徐族人，但尚待進一步查證。參杜貴墀，《巴陵人物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史部冊 29，頁 78。
 - 3 此據劉璣的自述。見劉璣，〈中華婦女界祝辭〉，《中華婦女界》，卷 1 號 1 (1915 年 1 月)，頁 1。
 - 4 林傳甲傳記資料可參考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黑龍江志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 2445-2446；《黑龍江省志·人物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頁 273-275；林正秋主編，《中國地方志名家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 264-266；李文炳、王洪生、范佩卿，〈教育家林傳甲傳略〉，

準備教材，而在極為倉促的時間下編了《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後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出版)。長久以來，此一著作一直被視為「第一部由中國人執筆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然而盛名之下，謗亦隨之，學者對林傳甲的這部著作多所批評，認為他對「文學」以及「文學史」的認知有很多不足之處。⁵ 誠然如此。然而最近幾年，幾位專研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包括陳平原、夏曉虹、戴燕、陳國球等，又重新審視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試圖給予較為公允的評價。陳國球便認為林傳甲編《中國文學史》，用心主要在「應當世之事業」，亦即教育，文學本非主旨。夏曉虹也指出林傳甲樂道新知，多感於時事，並不是一個昧於新時代的冬烘先生。戴燕更以後設的眼光閱讀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發現他較為保守的陳述方式或者留給我們更大的詮釋空間。⁶

文學研究者比較容易忽略的是，林傳甲在 1905 年離開京師大學堂之後，短暫赴日考察，然後奉派到廣西，但同年 12 月隨即又被調到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任用，開始全力投入黑龍江省的教育事業，在現代教育上扮演開疆闢土的先鋒角色。徵召林傳甲的是當時黑龍江副都統程德全(1860-1930)。林傳甲奉派在黑龍江設立學務處，開辦小學堂及該省第一所幼女學校，女校由夫人祝宗梁主導。⁷ 林傳甲到黑龍江赴任，對黑龍江的教育現代化作了很大貢獻，而就私人的層面來看，這個決定更對他的家庭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林傳甲在 1916 年因病辭職，離開黑龍江，轉往北京，之後足跡更遍及各地，一方面開拓教育，一方面總纂《大中華

《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期 1(1989)，頁 94。

- 5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pp. 129- 134.
- 6 參見陳平原，《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序」；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83-184；陳國球，《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前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 6；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陳國球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頁 345-350。
- 7 姜樹卿、單雪麗主編，《黑龍江教育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 305-307。

地理志》。1906年到1916年的十年之間，整個林氏家族都在黑龍江擔任教育者。

綜合各種教育史及地方史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勾勒林傳甲家族的經歷。林傳甲到黑龍江赴任，妻子祝宗梁也隨任。1906年，清廷尚未頒訂〈奏訂女學堂章程〉，祝宗梁已在黑龍江開辦了第一幼女學校，後來又創辦多所學校，包括女子小學堂、女子師範、女子中學等。林傳甲的母親劉璣則從奉天（瀋陽）女子師範監督的任上轉來黑龍江，一開始辦理蒙養園，開發幼稚教育。1914年，劉璣開辦「黑龍江女子教養院」，專門收容並訓練貧窮或受災家庭的幼女，不幸於1915年辭世。之後，林傳甲與祝宗梁也離開黑龍江，計畫在其他地區繼續其教育事業。這一家母、子、媳三人全部投入黑省的現代教育，直到今天，黑龍江地方史志仍對他們在教育上的貢獻備加推崇，稱之為黑龍江教育現代化的先驅。其實，林傳甲原先與黑龍江並無淵源。他是福建人，在杭州求學，之後曾遊歷四方。由他的讀書筆記可以發現，林傳甲興趣廣泛，尤其醉心算學與輿地學，⁸ 身後也以地理方志學家留名。顯然，文學或者中國文學史可不是他唯一的興趣或專長。林傳甲著作甚豐，作品刊載於各種類型的雜誌刊物，出版的專書也很多。學者已經指出，在林傳甲諸多出版品中，《黑龍江鄉土志》特別值得注意。原來他到任後，便開始研究黑龍江地方的歷史、地理與習俗，廣搜資料後，撰成此書，準備作為鄉土教材，引導當地學生認識地方文史。戴燕便指出，在林傳甲編寫《黑龍江鄉土志》的同時，劉師培、陳去病等發起的國學保存會也正在編纂鄉土歷史與鄉土地理教科書，以求「愛鄉愛國」。⁹ 由此可見林傳甲學術興趣的脈絡。

筆者在檢視20世紀初期的婦女刊物時，發現許多與林傳甲家族有關的材料。林傳甲及其母、妻顯然都對雜誌這種新媒體很有興趣，更不遺餘力地藉此宣揚自己的成就。他們的文章多半有關在黑龍江開發教育的

8 戴燕閱讀林傳甲的《籌筆軒讀書日記》，發現他在湖南期間博覽群書，而在1900年的《籌筆軒讀書日記》中，所列「學者必讀之書」，多以實用之學為主，最看重的學問則是算學與輿地之學。參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頁183-184。

9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頁189。

經驗，由於作者的文字往往衝勁十足，讀來令人渾不知文章究竟是介紹黑龍江教育現代化的過程，還是作者藉文字上台演出，表現強烈的自我意識。這在劉璣與祝宗梁的身上特別突出。這個有趣的現象其實關連到傳統才女在 20 世紀初期發展出的「雙重面貌」。我所謂雙重面貌，指的是傳統才女一方面發現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可以完成前代女性絕無機會的事業；另一方面，她們一如前代才女懂得運用文字，現在更學會文字遠為龐大的新力量，因為有了報刊雜誌等媒體。我們還應該注意，林傳甲也很熱心宣揚家族女性的成就。當他的母親劉璣於 1914 年出關到黑龍江加入他的教育事業時，林傳甲還準備了一幅「女學界歡迎慈母圖」，並將題詞發表於雜誌上，¹⁰ 可見其頌揚母親的心意。誠然，明清時期有不少文人提倡婦女文學，也留心為女詩人留下記錄，但是林傳甲為家族女性求名的作為畢竟不盡相同。我們不妨回顧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任教時，江亢虎（1883-1954）是他的同事，還為他的《中國文學史》寫了序。江亢虎後來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員，因此他的身後之名是「漢奸」，但是在晚清時期，他可是一位於積極的改革者。同時，他還熱心女學，甚至曾於 1905 年在北京設立一個「女學傳習所」。¹¹ 林傳甲與江亢虎或者在婦女問題上也曾經互相影響吧。然而，雖然同樣支持改革，但江亢虎是無政府主義者，林傳甲則是孔教信奉者，二人的立場實在不盡相侔。劉璣自己雖然致力女學，也不甚認同「兒子的朋友」江亢虎的女學觀，認為他過於激進，這也是很有趣的，下文我將再次提及。

我們若直接閱讀劉璣發表的文章，便可對所謂傳統才女的「雙重面貌」有進一步的瞭解。

1915 年 1 月，有兩份以婦女為標的的雜誌在上海創刊發行。其一是《婦女雜誌》，其二是《中華婦女界》。劉璣為兩份雜誌分別寫了祝詞，刊登在創刊號上。雖然名為祝詞，劉璣對雜誌的頌贊與期許不過數言，兩篇文章的主旨都是宣揚黑龍江婦女教育的現況。例如，她在《中華婦

10 林傳甲，〈題女學界歡迎慈母圖〉，《宗聖匯志》，卷 1 號 11、12（1914 年 12 月）。此文筆者尚未得見。

11 汪佩偉，《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頁 18。

女界》的創刊祝詞中這麼說：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上海中華書局中華婦女界出版，標賢母良妻淑女主義，蔚為巾幗之光華。是日也，中華民國極東北隅，黑龍江上，有女子教養院成立，殆亦中華婦女界前古未有之舉，與中華婦女界同為吾女界之明星。¹²

同樣的，她也在給《婦女雜誌》的創刊祝詞中介紹自己創辦的黑龍江女子教養院。在這篇文章中，她更完整發揮自己遠赴黑龍江發展婦女教育的理論：

人生天地間，不可一日無所養，即不能一日無所教。吾國女子，自媧皇至今五千年，大抵養而弗教，禽息獸視，如渾沌未開之天地。一部廿四史中，女子之流芳百世者，曾不數十百人，如一線之曙光。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見勢絀，乃知歐美列強縱橫於世界，非徒船堅礮利也，實由賢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於內，為國民之後盾也。起視吾國婦女，倚賴成性，失養失教，能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耶！¹³

此處的論調，顯然與當時主導東亞婦女論述的賢妻良母主義若合符節。劉璣相信婦女教育的目的在於製造賢妻良母，從而成為富強國家的支柱。然後，她便轉向自己，描述本人的經驗：

吾輩老嫗，十年前歷經患難，固嘗紡織縫紉而後得衣，播穫烹飪而後得食，牽蘿結茅而後得住，此貧家婦女所同也。若夫秉承庭訓，以正心誠意明其德，以讀書勵志淪其智，以弓馬擊劍鍛鍊其身體，當時少年婦女，罕有同志焉。可知教育不善，雖有一二受教育者，終亦老於深閨，無益於國也。¹⁴

劉璣在這段文字表達的重點是對實用性的信仰，她所謂實用，指的是女性有能力養活自己，並且進而有益於國家社會。劉璣提及「弓馬擊劍」也值得注意。在讀書以外，兼習弓馬，這顯然與她將門虎女的家庭背景

12 劉璣，〈中華婦女界祝詞（一）〉，《中華婦女界》，卷1號1（1915年1月），頁1-2。

13 劉璣，〈發刊辭二〉，《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頁2-3。

14 同前註，頁3。

有關，而且也影響她所設計的婦女教育內容，特別重視體育。然後，劉璣便敘述她之前曾旅行各地，考察婦女教育的情況：

近十數年，女教漸興。…鄙人不敏，亦嘗沿長江暨沿海以考察之，又沿鐵路，經中原，入京華，出塞外，以考察之。¹⁵

之所以提起這段經歷，自然是要強調自己在遠赴黑龍江以前，便對婦女教育這個問題關心已久，故而她的看法稱得上專業意見。然而，雖然劉璣提倡婦女教育，她對婦女參政權卻抱保留的態度。她的說法是：「自由之說，決裂範圍，平權之風，競求參政，果何益於國也。」¹⁶ 稍後在另一篇文章〈中華婦女之生計〉中，劉璣也批評教育不注重生計，將使得全國都是「高等流氓」，婦女「侈言參政運動選舉」，捨本逐末。¹⁷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下，劉璣並不贊成冒行自由平權，認為不但危險，且無益大局。祝詞的最後，劉璣開始介紹她自己正在進行的婦女教育事業：

久欲廣立孤兒院，施以小學實用主義，而力不果。鎮安右將軍朱巡按使乃三顧蓬蓽，諮以女子教養之事，將移殖女民以實邊塞，璣乃以垂暮之年，為此報本返始之計。…自今日始，吾願吾婦女界之主持女教者，致力於衣食住之本原。¹⁸

她再次強調實用價值的重要性，堅持女教的重點（本原）是日用民生，並且說明了自己與黑龍江教育發生關係的一段本事。不過這裡最值得留意的線索，乃是所謂殖邊政策的問題。此處所稱「鎮安右將軍朱巡按使」指的是 1912 年開始主導黑龍江的朱慶瀾（1874-1941）。劉璣提到朱將軍正在進行一個計畫，鼓勵中國其他地區的婦女移民到黑龍江。稍後我們便會發現，這個政策將直接影響劉璣作為教育者的工作規劃。總而言之，在兩篇發刊祝詞中，劉璣都努力為黑龍江的教育發展以及她本人的貢獻大打其廣告。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17 劉璣，〈中華婦女之生計〉，《中華婦女界》，卷 1 號 4（1915 年 4 月），頁 2。

18 劉璣，〈發刊辭二〉，《婦女雜誌》，卷 1 號 1（1915 年 1 月），頁 3-4。

1915年當年，直到劉璣病逝，《婦女雜誌》與《中華婦女界》這兩種月刊，幾乎每一期都有劉璣的稿子刊出，全部都與婦女教育有關。她的討論重點有三。第一，婦女作為教師的角色與任務。劉璣發現傳統由婦女負責的家庭手工如自製衣履、縫紉刺繡等，已經被工商業取代，幸而有新事業興起，使女性得以追求正當職業，如工廠女工、售票員、會計、看護，以及教員，女性的生計遠較過去廣大，劉璣稱婦女工作範圍的轉變為「失之於彼，則得之於此，亦天地間自然之理也」。而其中自以教育業最受她的重視，認為這是「生計愈艱，則智力愈進」的表現。¹⁹她在〈中華婦女之責任〉一文中則說，「中華婦女之責任，果安在哉？義務教育是也。」²⁰她進一步主張，「法國之鄉學，夫婦同負責任，美國之小學，婦女完全負責。中華苟欲取法共和先進之國，其必師法美國乎。」²¹也就是說，中國女性應當全面「接收」小學教育的教職。因為有此信念，所以劉璣接下去自稱「吾欲使全國小學教員，皆用女子，奔走南北，發起女學。」²²同樣的，發表於《婦女雜誌》的〈義務教育責在婦女議〉一文中，劉璣也提出類似的主張：「共和國義務教育，宜取法於北美，初等小學教員，宜全以婦女任之。而後教育可普及也。」²³為什麼說用女子教員有利於全國教育普及呢？她的理由是，首先，中國政府財政困難，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教育經費以供辦學，因此，教師的薪資相當微薄。如果男子充當基層教師，為了養家活口，必然不能久安其位。相反的，女性所求不多，若擔任教職，雖然報酬有限，仍能堅守崗位。教學重經驗，為了學生受教著想，自應任用女教師。那麼，中國女學本身尚未發展成熟，哪有這麼多女教師，服務全國各地的小學？這是一個自問自答的修辭性問題。一方面，她承認「吾國師範生額數，分配全國學齡兒童，不敷甚鉅。」但她以自己在黑龍江辦學的經驗，指出這

19 劉璣，〈中華婦女之生計〉，頁2-3。

20 劉璣，〈中華婦女之責任〉，《中華婦女界》，卷1號3(1915年3月)，頁1。

21 同前註，頁3。

22 同前註。

23 劉璣，〈義務教育責在婦女議〉，《婦女雜誌》，卷1號6(1915年6月)，「女學商榷」，頁5。

個問題絕不難解決。所謂：「黑龍江女學初興，只女教員一人，用鄭康成高足弟子轉相授受之法，…吾國教育欲普及，其可不用女子講習生乎？…江省女學人數，較各省為多，經費較各省為少，皆講習之效也。」²⁴ 對我們來說，劉璣的理論相當糾結。一方面，她難逃性別偏見的指責，因為她竟公然認定男女同工不同酬，而且似乎不以為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睜大眼睛注意，劉璣提倡的可不只是女老師教女學生，而是由女性全面性接管基層教師這個職業，小學教師全部由女性擔任，換言之，在她的藍圖中，小學男老師將被淘汰。劉璣之所以作此主張，應該與她的實用主義有關，也就是說，她一向堅持婦女教育的第一要務，在於使婦女有能力養活自己，對她來說遠遠超過自由平等與參政權等似乎渺不可及的理想。特別引人興味的是，劉璣對法國與美國初等教育的認知，究竟從何處得到的呢？畢竟，根據劉璣的自述，在 1915 年，她已經 67 歲。最可能的猜測是，熱愛新知的兒子林傳甲影響了她的視野。第二種可能，則是她稍早或者曾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有直接接觸，尤其是當她在湖南長沙居留的時期。這一點我稍後會進一步探討。

本文的第二個重點是討論婦女殖邊政策。前文已經提到，當時朱慶瀾正在鼓勵中國其他地區的婦女移居黑龍江，而「黑龍江女子教養院」正是此一政策的產物。根據林傳甲在《黑龍江教育狀況》書中的說明，朱慶瀾發現絕大多數移居黑龍江的人民都是男性，無以為家，因此難以安居樂業。朱慶瀾因此決定設立基金，派員前往各災區招募——以及購買——年幼婦女移居黑龍江，以增加該省的女性人口。前來殖邊的幼女，將安排進入職業學校就讀，一切用度由院方負責，待適齡，由當地政府為之擇配。²⁵ 第一年就招收了 162 個學生。²⁶ 所以劉璣負責設立教養院，乃是受命於朱慶瀾，落實政策。劉璣還把朱慶瀾呈請總統設立

24 同前註，頁 6。

25 謝嵐等主編，《黑龍江省教育史料選編》（上編）（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頁 351-367。

26 陳東玲，〈朱慶瀾興辦省女子教養院〉，《黑龍江史志》，期 3（1992 年 6 月），頁 51。

教養院的章程案由，以及派任院長的公告等，都發表在《婦女雜誌》創刊號上。在這份文件中，朱慶瀾稱：「查有前奉天女子師範監督劉璣，年高德劭，允為女宗，學問確有本原，閨閫奉為模楷，堪以擔任完全永久義務，合行飭委為該院院長。」²⁷ 同文附有教養院的章程，其中若干條目說明了教養院設立的宗旨與方式：

本院專以收養本省及各省貧苦無依之女子，授以普通文字工藝，造就成人，立家庭教育基礎為目的。…第四條，入院女子以年齡在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為合格。…第十條，本院分為高初兩級，按照小學校令及女子職業學校規程，酌量加減科目，以能自立營生為度。²⁸

顯然，設立這所教養院便是為了為黑龍江省訓練女性移民。雖然朱慶瀾的政策涉及買賣婦女，以及剝奪婦女的婚姻自主權，但是劉璣本人並不考慮這些層面，或許因為她自己幼年也是個孤女，她對這個政策非常支持，例如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京師) 八旗生計艱難，亟待移殖。」²⁹ 在她的描述中，她全家都為了這個重大的任務而奉獻心力。為了設立教養院，長子林傳甲與三子傳臺被派為籌辦專員，次子傳樹派為駐京調查專員。同時，她還提到長媳祝宗梁本來在黑龍江創辦女子師範及中小學校，有十年經驗，現在也襄助教養院的計畫；次媳淑嫻在北京勸八旗孤貧幼女移居邊省。三媳趙眾陶負責簿記。她甚至不忘提及長孫女林德育(傳甲之女)，說她仍在黑龍江省的女子師範第四年級就讀，這一次也盡己所能，依照教養院的院訓而製成院歌。³⁰ 劉璣歡喜稱此為「家庭教育」的收穫，意謂自己教子有方，而其實她在這裡所塑造的形象正是一個「教育家庭」。劉璣一方面籌辦教養院作為殖邊政策的後盾，一方面撰文論述婦女與殖邊的關係。在〈中華婦女之移殖觀〉一文中，她

27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文告章程一柬〉，《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紀載」，頁3。

28 同前註，頁3-4。

29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成立狀況〉，《婦女雜誌》，卷1號3(1915年3月)，「紀載」，頁5。

30 同前註，頁4。

嚴肅討論邊境地區男性人口遠超過女性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就她的觀察，新時代的婦女眼界漸開，「近十年來女子移民漸興」，所以她樂觀推測，「他日中華婦女立業於邊地者，必自女學始也。」也就是說邊境地區特別適合婦女開發擔任教師的機會。她又對往昔出於無知而不敢遠行的婦女相當鄙視，認為「女學興，則婦女智識開，不以遠遊為可戚」，於是將有更多婦女願意到邊境擔任女教師，使得女子也有「化行塞外」的發揮餘地。總而言之，劉璣對黑龍江（以及自己）非常自豪，因為，根據她的看法，黑龍江雖然遠在極東北的「奧區」，又是文明初闢之地，但是當地的學校卻是「各省女師雲集」，統計共十二省，她因此高呼「亦盛事乎！」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她甚至附錄了由各省來到黑龍江的女性教員名錄。³¹ 由以上引述的論證可知，劉璣一方面固然在宣導「移殖」，但更重要的是對婦女提倡「探險」、「成就」與「發展」等以前在女性身上不受鼓勵的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明顯得見，劉璣不但追求成就，還追求名聲；她努力透過訊息中心的上海媒體，宣告她在中國極東北的作為。這位年事已長的女教育家顯然熟知新媒體的力量，而且打算盡可能利用這個力量。她在一篇文章中公開發言，為了籌辦黑龍江女子教養院，她擬定了一連串工作計畫，其中便包括「學說之出版（版）」一項，她說：「一月一日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婦女雜誌出版。中華書局有中華婦女界出版。兩大雜誌之發刊辭，皆遠來徵文。璣幸茲院成立之始，有此兩大雜誌為言論機關，以鼓吹此特殊教育，凡璣所有詩文舊稿，亦得流布海內，就正有道焉。」³² 的確，劉璣對雜誌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除了發表文章討論婦女教育以外，她還安排自己的文藝作品在雜誌上刊登。事實上，她甚至將自己多年前喪夫時，為亡夫林文釗所寫的誄詞，也投至《中華婦女界》公諸於世。她還為這篇誄詞新寫一篇序文，主旨則是記錄自己教子長成的經過。她說：「璣教授三子傳甲、傳樹、傳臺，隱居應山理學街錫善堂十二年，率三子出山，遊學南北，越三十二年，於是璣之學

31 劉璣，〈中華婦女之移殖觀〉，《中華婦女界》，卷1號5，頁1-4。

32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成立狀況〉，頁10。

說，重於中華婦女界。檢未刊稿誄詞，柳下氏遺韻存焉。爰以誄詞公諸世。」³³ 這篇序文的邏輯相當有趣。劉璣大概跟許多傳統才女一樣，平日作有詩詞文稿，但只能藏之篋中。直到她以教育前鋒者的姿態出現，自信聲名已遍傳全國，這才有機會發表作品。換句話說，杏壇儼然成爲文壇的晉身之階了。同時，多年前過世的林文釗，論官位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典史，若不是有劉璣這樣的妻子，不但爲他寫誄文，還藉雜誌公諸於世，恐怕也難有爲人聽聞的機會。以上所引的序文，更透露了劉璣過人的自信。她的自敘文字煞費苦心，我們不妨細讀。首先，她把自己呈現爲一個成功的賢母，在艱困的環境中靠自己的力量教子成人。不但如此，她的兒子長成以後，劉璣並不像千古以來的倚門老母，揮淚送別遊子，而是自己「率領」他們離家遊學。同時，當兒子們追求立身成名時，她也忙著建立並傳播自己的學說。劉璣爲自己建立的形象，的確相當鮮明，既遠違傳統才女的生命軌跡，也不同于清末以來英雌女傑式的革命女性。應該說，劉璣是選擇順應（或者說利用）時代的改變，將傳統的母教模範發揮到極致。

劉璣諸多議論文字的另一個重點則關涉一個極爲艱難的任務，更顯示她的雄心壯志，這便是解決女校的財政問題。在〈女子教育宜謀經濟獨立策〉一文中，劉璣提出兩點主張。第一，中國貧弱，國庫空虛，力不足以支應男校的財政負擔，遑論女校，因此，女校必須自籌財源才能生存。她心目中的理想是美國私立大學，「歲出百萬元，不需國家補助」。第二，女子教育的核心必須設定爲職業教育。她以爲，與先進國家如美國相比，中國女校的財務情況非常窘迫。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不但中國婦女不思尋求個人的經濟獨立能力，教育者也不思尋求學校的財政獨立，劉璣認爲這種依賴的態度必將導致婦女教育的崩潰。她堅決認爲國家的基石是教育，而教育之本則是經濟獨立。爲救此燃眉之急，劉璣有一個構想，她發起募捐，呼籲婦女捐出簪珥首飾，成立全國婦女銀行，然後「建全國鐵路，用其餘利以辦理全國小學，悉以婦女爲教員，崇尚

33 劉璣，〈林典史誄〉，《中華婦女界》，卷1號6(1915年6月)，頁6-7。

實利主義，永維世界和平」。也就是說由婦女自己出資，實業營利，然後統籌全國小學教育，以婦女擔任全國小學教師，於是，便可一方面達成學校財務獨立，一方面也促成婦女個人的經濟獨立。偉哉斯夢，但其難度之高，無庸贅言。不過在這個全國婦女實業的夢想達成以前，劉璣的確對自己創辦的學校的財務狀況有所規劃。她計畫取法美國女子教育，終身募款，作為學校基金。³⁴ 根據她在〈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成立狀況〉一文中的報導，該校經費來源分別來自官員與鄉紳捐款、收公產、以及用公款購買產業等，其主要收入為租穀。同時，未來她還預備建築市房，之後「不需成本，籌增學款，俾三年以後，將建築之墊款歸還，按月收租，以備本院之用」。其他的增產計畫包括：由於蒙旗都捐出牲口，計畫設牧場；計畫進行農墾；計畫開辦縫紉工廠，令職業班高等小學班每日實行縫紉工作等等。雖然這些計畫顯然都還是紙上風雲，劉璣對自己能夠獨力經營教養院，仍然充滿自信與自傲，甚至提出待教養院穩定之後，將在黑龍江全省各縣分別設立經濟獨立的女子學校。至於婦女個人的經濟問題，劉璣的主張仍是以職業教育為先，使婦女在競爭的世界中可以謀生。³⁵ 根據她的報導，在黑龍江女子教養院中，初等小學收 7 歲至 10 歲的女生，「實行直觀教授，採用蒙台梭利新教育法」，同時將鄉土歷史、地理、理科等列入科目。當然，此一課程設計讓我們想到記錄中林傳甲的各種學術興趣，以及編纂《黑龍江鄉土志》作為教材的事蹟。14 歲到 15 歲的女生則編入女子職業科，除小學國文外，加授女子尺牘、日用須知等普通科目，二年後，再由醫術、產婆、看護、商業簿記等專業中選擇一種，訓練女生謀取適當職業。³⁶

前文已經提到，劉璣堅持賢妻良母的價值。我們也已經看到，她利用各種機會宣揚自己作為賢母的成就。她還曾經嚴詞批判因溺愛而不允許子女離家求學的老年女性，她說：「若言送其子女入學，或留學，則

34 劉璣，〈女子教育宜謀經濟獨立策〉，《婦女雜誌》，卷 1 號 2 (1915 年 2 月)，「論說」欄，頁 12-14。

35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成立狀況〉，頁 3-10。

36 同前註。

其母戀戀不能舍焉，其祖母尤戀戀不能舍焉。此種老媪，兒時既未受教育，垂老之時，尤為教育之障礙，非吾國民之蠹歟！」³⁷ 以賢母的身份批評無知「老媪」成為現代教育的障礙，似乎分外嚴厲。當然相對的，劉璣自己的賢母位置就更加鞏固了，她的兒子林傳甲也樂於撰文稱揚母親的成就。有趣的是，劉璣家庭都是儒教追隨者，她主張今日中國應該將孔母奉入聖祠祭祀，並以孟母陪祀，因此曾將此議寫成專文，刊載於《宗聖雜誌》。³⁸ 查該刊物的目錄，劉璣確以「奎垣蒙養園長」的名義（1914年當時尚未籌設女子教養院），在1卷7號（1914年2月）刊出〈建孔母祠議〉一文。³⁹ 根據劉璣的說法，許多省分的孔教會因此而從善如流，決定奉祀孔母。⁴⁰

劉璣過世後，長媳祝宗梁將她留下的若干解說《孟子》的片段，刊登在《婦女雜誌》上，題為《續孟軒說經粹語》。所謂續孟軒，正是劉璣在湖南長沙時期居所的名稱。顯然，續孟者，續孟母之教也。也就是說，劉璣提議奉祀孔母，乃是刻意提高母親的道德位置，包括——或者說尤其是——她自己。祝宗梁的一番說明頗令人印象深刻。她說：

前清光緒丁酉戊戌，林子傳甲主講衡州之時務學堂，同時，梁君啟超亦在長沙時務學堂講孟子及公羊傳。林下老人則專以孟子教授。當時黨禍遽作，梁書被禁，賢母之教亦不顯。今民智大開，檢點遺篋，所存經說不多，用為國民教員講義可也。⁴¹

林下老人即劉璣。這段文字雖然出自劉璣至親之手，卻頗啓人疑竇。祝宗梁顯然意圖將林傳甲及劉璣母子與梁啟超並論，然而，所謂「林下老人專以孟子教授」，難道指的是劉璣也在時務學堂任教？然而長沙時務

37 劉璣，〈女子教育宜謀經濟獨立策〉，頁13。

38 劉璣，〈婦女迷信宗教與道德關係〉，《婦女雜誌》，卷1號4（1915年4月），「論說」欄，頁9。此處提到的《宗聖雜誌》是一份孔教刊物，由山西太原文廟宗聖社會編，1913年月至1914年6月稱《宗聖匯志》，之後由山西省城宗聖總會編，稱《宗聖學報》，1923年9月以後停刊。參見《中文期刊大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23。林傳甲也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

39 參見《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頁661。

40 〈婦女迷信宗教與道德關係〉，頁7-9。

41 祝宗梁，〈續孟軒說經粹語〉，《婦女雜誌》，卷3號4（1917年4月），頁18。

學堂的記載並沒有任何女性教員的紀錄，這是可以確定的。或者，此處指的是衡州時務學堂，而祝宗梁提到梁啓超，只不過是爲了抬高她的身價。即使如此，以一女性而在非女校的學堂授課，總是特殊的情況。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劉璣任教的學校是女學堂。實情如何，目前難以釐清。不過，劉璣對《孟子》說解相當有趣，自成一格，如見其人。姑舉數例，略作案語：

孟子者，孟母之子也。為人子者，須學孟子，不可忘孟母之遺訓。

案：這是劉璣註冊商標的邏輯，以母教爲最優先。即使要曲解「孟子」稱謂的意思，也是在所不惜。

第一章義利之辨最分明。無論何國法制，必要辨明權利義務。

案：《孟子》的義利之辨，當然不是權利義務之謂。劉璣爲了帶入現代意識的權利義務觀念，同樣不惜扭曲經典原意。

漢儒講究訓誥，不如關壯繆宣昭大義。宋儒高談心性，不如岳武穆不怕死不要錢。

案：劉璣提出的是關公與岳飛的崇拜。我們當然大可推測她以（晚清）當時的官場爲批判對象。

梁惠齊宣稱王，孟子亦從而稱之，說以王政，期以王天下。不必扶助衰周也。

案：這一段是說孟子承認了梁惠王、齊宣王稱王的正當性，若能施行王道，那麼便不必固執於已經衰敗的周王朝。放在晚清的脈絡裡來看這段話，的確頗爲曖昧而具顛覆性。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名世之統，由帝而王，君降而相。周公是貴族共和，孔子是平民政治。

案：同樣放在晚清的時代脈絡裡，「平民政治」的說法不免令人多所聯想。劉璣是否在暗示民主呢？

如果以上引述的《孟子》說解真的是劉璣在湖南教書時的言論，當時的情境究竟如何？可惜目前我們還沒有資料重建這段時期劉璣的生活與事業。一個傳統才女出身的「老嫗」，如何在晚清時期便發出種種出

格的論調，而在民國初年又自命為邊地的教育推手，實在是個引人入勝的話題。

劉璣主張婦女應先尋求經濟獨立，而非追求自由平等等權力，這樣的態度相當明確。然而她對國家政治議題卻是相當熱衷的。由於日本在1915年1月提出「二十一條」，中日關係緊張，1915年4月上海發起了救國儲金運動，一時之間造成全國性響應，但這個運動隨即在次年宣告失敗。⁴² 根據林傳甲的追述，遠在黑龍江的劉璣也積極投入救國儲金團，竟因此積勞辭世。《婦女雜誌》1卷9號刊載了劉璣的遺著〈黑龍江救國儲金團演說書〉，⁴³ 在這篇文章中，她將自己作為一個老年的、女性的、以及在邊境工作的教育家的認同，與愛國運動結合起來：

余嘗遊川邊黔苗粵獠之境，其民知有土司，而不知有國也。內地窮鄉僻壤，其民知有鄉黨鄰里，而不知有國也。市井之民，則縣有縣界，省有省界，亦只知有縣有省，而不知有國也。外人譏我二十二行省為二十二國，李文忠公謂甲午之戰，以北洋一隅，當日本全國，皆我國民無國家觀念所致也。……國民教育之義務，今年已風動全國矣。黑龍江…內地所視為困難而不能即辦者，黑龍江人少之區，亦或簡而易行，且鐵軌直接歐洲，尤得風氣之先，不出戶庭，可與歐美人士相見。國家思想，民族思想，因此發起，而救國儲金團以成。救國儲金團，本由上海發起。不一月而全國響應。…救國儲金團既成，學界任職務者，以余為最長。蓋行年六十有七矣。此六十七年中，歷見越南，緬甸，琉球，朝鮮之滅亡。庫頁、臺灣、帕米爾之割讓。旅、大、膠、澳、威海、九龍之租纂。有生之日，皆國恥之日。今日少年詈罵吾輩老朽為頑錮，不知愛國，不早救國，以致國

42 有關救國儲金運動的研究，可參見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67-74。有關該運動失敗後的輿論與處理方式，參見賀俊杰，〈1915-1916年救國儲金運動結局述略〉，《民國檔案》，2006年2期，頁74-80。

43 根據林傳甲所說，這是劉璣在壽終前十三日之絕筆。參見林傳甲於其女林德育〈京師白雲觀遊記〉一文後的附記，《婦女雜誌》，1917年4月，「記述門」，頁5。

家失敗，至於此極。吾儕老朽，誠不能辭其咎。是以對於國家國民之公益，竭棉薄之力以服永久完全義務。⁴⁴

這篇文章不只是響應愛國儲金運動而已，更應視為作者的自我定位。大致說來，她提出了三個可以稱做優勢的個人特點。第一，年高德劭。劉璣自稱是愛國儲金團年齡最長的學界成員。她的論點是，因為年長，所以身經諸多國恥，背負誤國的罪名，因此現在更需要為國盡己。當然，反過來說，這也為年逾花甲的「老嫗」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第二，多遊歷見聞。她一向非常看重自己的旅行經驗，在較早的文章中稱之為教育考察，在這裡則成為觀察各地人民國家意識的途徑。第三，地處邊境。劉璣移居黑龍江之後，對該地表現高度的認同，並且積極發展鄉土論述。她在這裏試圖塑造黑龍江的新形象，亦即「因為」地處偏遠，人口又少，「所以」辦事易於成功，人民的意識也易於改造，劉璣還說黑龍江地處邊境，而成為歐洲思想與風氣輸入的窗口。總而言之，老年、偏遠等看似不利的因素，都被劉璣轉化為國民之母、國民之師的塑成養分。根據統計，當時各省響應儲金運動，齊齊哈爾（龍江縣）收金超過十萬元，「還在江浙各市縣之上」，使得當代學者也為之印象深刻。⁴⁵ 我們無法證實身在齊齊哈爾的劉璣的奔走在此事上究竟發揮了多少影響力，但是其中必有若干關聯性，不得不使人對她更加刮目相看。

當期的《婦女雜誌》在登出劉璣遺著的同時，也附上了一段識語，稱她是「晚近女學之泰斗」，且「所著論說及《林下詩存》、《絳幔吟》等，均已揭載本報。近以提倡救國儲金事，積勞殞化，沉沉女界，失此明星，即本報亦感悼無已。」⁴⁶ 林傳甲更在文後的誌語中極力稱揚劉璣的功績，鞏固她作為黑龍江女學鼻祖的地位。林傳甲如是說：

此我先妣絕筆之文，《林下文存》最後之一篇，純乎愛國之金石言也。自救國儲金團發起以來，少年激烈者，或以死建言，

44 劉璣，〈黑龍江救國儲金團演說書〉，《婦女雜誌》，卷1號9（1915年9月），「紀載」，頁1-3。

45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73。

46 同前註。

先妣則從容勸導，奔走勸導，務使漢滿蒙回各族同胞，曉然共喻。竟以年老力衰，積勞致疾，遂以不起。嗚呼，含殮之日，女生哭弔者千人，葬於黑龍江省城東北一里三株樹西，永為龍江女學鼻祖。每日晨昏，必有女生繞墓而哭，誦此絕筆之文，大呼愛國云。嗚呼！⁴⁷

此處提到劉璣勸導「漢滿蒙回各族同胞」，顯示她在黑龍江地區從事教育時接觸各族群的情況。林傳甲的識語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以劉璣的愛國精神加強其女學鼻祖的形象。事實上這應該也是劉璣期待的形象。身為武將之女，劉璣本來就對女英雄的形象相當認同。在《婦女雜誌》創刊號的「文苑」欄中，她選刊了自己的五首詩作，其中四首是題清代才女王采蘋畫屏四幅的律詩。王采蘋(1826-1893)是著名晚清閨秀詩人，常州詞派女詞人張紈英之女，她的許多作品都表現了對當代政治情勢(尤其是太平天國之後的局勢)的關懷，本不是尋常閨閣傷春悲秋之作。⁴⁸王采蘋的四幅畫屏都以女英雄為主題，分別是木蘭、二喬、梁夫人與秦良玉。劉璣的題詩也寄託了她自己的身世之感與豪情壯志。例如第一首題「木蘭從征圖」云：

機杼聲停東閣東，新粧卸卻便從戎。黃河黑水臨前敵，鐵甲銀刀別故宮。十載干戈同將士，一時巾幗忽英雄。可憐吾父沙場老，涕灑天涯恨未終。⁴⁹

末兩句指涉劉長清殉職一事，深恨自己未能如木蘭一般代父出征。又如題「秦良玉倚馬圖」云：

桃花小馬是名駒，馬上紅粧一色朱。英武足教豪杰媿，輕盈不用健兒扶。金鈴箇箇鏘鑾珮，玉帳重重握虎符。惆悵殘疆徒苦守，雲臺未畫美人圖。⁵⁰

47 同前註。

48 參見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30-164。

49 劉璣，〈林下詩存〉，《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文苑」，頁6。

50 同前註。

此詩的詩意也很顯豁，作者鋪陳秦良玉令人欣羨的女英雄形象，但是又為女將雖然戰功彪炳，卻不得畫圖於凌煙閣上而抱屈。這幾首詩乃是應王采蘋畫屏而作，一方面顯示劉璣認同王采蘋所代表的以閨秀才女而關心國事的傳統，一方面也透露了作者本人對英雄事業的抱負，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也。對劉璣而言，國族情懷與教育事業本是一體，正如她在〈龍江懷古〉這首長詩中所述：

黑龍江上開洪荒，天造草昧事渺茫。……康雍之際庶事康，咸豐定約敵勢猖。庚子之役事可傷，瓊瑋碧血膏鋒芒。江山大好閱興亡，其亡其亡系芭桑。我來吊古登高岡，綢繆未雨秋氣涼。……近代練兵羽檄忙，安得猛士騎驢驢。城下盟成玉帛將，媚外怯敵如女郎。徂東零雨破斧斫，收拾獨賴程雲陽。十年生聚慶豐穰，郡縣編制易旗幟。百端草創多未遑，杞人憂國多悵。前人已去流水決，窮邊極目天蒼蒼。⁵¹

此詩將黑龍江的興衰視為中國國勢的晴雨表，並懷念程德全將軍在黑龍江所建立的事業。以「杞人」自居的作者，也隱然誓以愛國英雄為標竿了。林傳甲在另一篇紀念母親的文字中，提到自己在黑龍江振興女教的事業都是稟母命而行，劉璣過世後，超過一千名女學生會葬於墓前，林傳甲認為這是劉璣作為教育者「化身千萬」的表現。⁵²

「假我三十年以營國民教育」——祝宗梁的教育版圖

林傳甲的妻子——即劉璣的長媳——祝宗梁，也是黑龍江教育史上有名的人物。各種記錄都指出她的先世是蒙古人，後移居河南固始，賜漢姓祝。她的家世相當好，曾祖祝慶蕃（1779-1853）是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祖、父輩也都是命官。據說祝宗梁幼年不習女紅，尤愛兵

51 劉璣，〈龍江懷古〉，收入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黑龍江志稿》，頁2608。

52 林傳甲，〈錫善堂教子記〉，《中華婦女界》，卷2號4（1916年4月），「文藝」，頁12。

器，⁵³ 不知有何為證，不過根據她後來在黑龍江教學時的課程設計，祝宗梁確實對體育相當重視。如此一位出身宦門的小姐，如何與仍是布衣的林傳甲結為夫妻，並無傳記資料的線索。我們只知道祝宗梁的父親在湖北為官四十年，⁵⁴ 可能林傳甲便是在湖北任教期間與祝氏結識，然而他們結婚的地點卻是宜昌。

林傳甲到黑龍江之前，祝宗梁在廣西已有辦學經驗（詳下），但並無特殊事蹟流傳。到了黑龍江之後，祝宗梁馬上身膺重任，負責設立該省第一所女學校，稱為黑龍江第一幼女學校。根據統計，上海經正女學以外，各省、市的第一所女學堂多在1900年以後始設立，特別是1904年以後。⁵⁵ 照此看來，黑龍江幼女學校之成立，相較起來也並不算晚。林傳甲在《黑龍江教育狀況》中，詳細記述了20世紀初開始，當地學校教育發展的情況。根據他的紀錄，在女子教育方面，民國前六年學部奏訂女學堂章程，尚未公布，程德全將軍便奏派祝宗梁創辦幼女學校。一開始創業維艱，累月招生，僅得18人，但次年即驟增60人。五年屆滿時，學生已超過260人，祝宗梁並呈請升辦女子師範學校。另一方面，祝宗梁又設立女子兩等小學校，以及女子初等小學，民國以來，初等女學逐漸劃歸地方管理。祝宗梁並提倡女子職業學校，民國元年曾與留學日本的馬玉瑜創辦女子職業學校，後來因經費問題而未成。為了快速預備小學師資，祝宗梁於民國元年設立女教員講習所，以師範教員傳習小學教員，作為一種補習教育。女子小學校進入狀況後，女子兩等小學校校長祝宗梁呈請升辦中學。此外，祝宗梁的女學生趙珩則到黑龍江其他縣分開發女學。數年之間，黑省女學校繼起，皆稱幼女學校。⁵⁶ 至1916年祝宗梁離開黑龍江，她與婆婆劉璣一直都是女學宗師。

祝宗梁既出身高門，照理說應該跟劉璣一樣，自幼通曉詩書。然而，

53 例如王延華，《鶴城晚報》，2006年10月27日版12，「卜奎人物」欄。

54 參《河南歷代名人辭典》，「祝宗梁」條，頁534。

55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27-29。

56 引自謝嵐等主編，《黑龍江省教育史料選編》（上編），頁351-352。

林傳甲卻提出不同的說法，而她本人甚至藉此使力，在黑龍江宣導女學。

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初二日呈給程德全請求設立幼女學校的文中，林傳甲寫道：

竊惟育才以學校為基，立教以家庭為始。蓋養蒙端賴夫母儀，而母儀皆原於女學。中國孔子、孟子皆蚤失怙，賴母教以成大聖大賢。…然皆獨善其身，教成於家，未有抗顏於女師，聚徒講學，移風易俗者。今中外大通，知東西各國教育，男女并重，閩、江、浙、湘、鄂女士負笈出洋者，或近至日本，或遠至美洲，歸而創建女學，風氣一變。又習於平等自由之說，不以中國倫理道德為之範圍。流弊日滋，轉為攻擊者所借口，興學志士轉為寒心。惟湖南女士根柢深厚較多。趙將軍撫湘，創設湖南第一女學堂。卑職母氏劉即揭《曲禮》首句：「毋不敬」為宗旨，啟迪幼女。去歲卑職就揀粵，挈職婦祝氏同行。職婦偕三品命婦謝劉氏等創辦桂林第一幼女學堂，亦確守「毋不敬」宗旨。職婦少不識字，年二十來歸。母授以《女四書》及《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蒙學課本》，心算，筆算，珠算教科書，速成虛字法。雖程度低淺，於幼稚教育尚有條理。卑職奉調來江，職婦亦奉母命偕行。屢蒙 軍憲面諭創辦幼女學校，且有女公子捐奩盛舉。職婦不學，何敢情於任事。…⁵⁷

林傳甲在此陳述的女學思考，實與劉璣一脈相承，尤其是對母教的頌揚，以及對傳統儒家道德的支持。劉璣一向以孔母、孟母為標竿，發揚母教，又倡議以實用主義的女子教育代替自由平等之說，前文已有所說明。而她後來在 1915 年寫的〈中國女學師範論〉一文中，也曾提到趙爾巽（即林傳甲此處提到的趙將軍）在湖南創辦湖南第一女學校，後為御史杜本崇彈劾一事。同時，她還提到林傳甲的同事江紹銓（亢虎）當年在北京辦女學傳習所，她說江紹銓「少小失恃，困於繼母，聰明智慧，通於佛教，遂於吾國禮教稍違異。及環遊地球而返，竟領袖社會黨，提倡社會主義，

女國民之氣焰日張，老成人咸以女學爲詬病矣。」⁵⁸ 這也等於呼應了林傳甲文中對當代女學發展的批評。母子二人的言論大約是相互影響的。不過，此處筆者注意到的是有關祝宗梁的部份。根據林傳甲所述，祝宗梁之前隨夫到廣西赴任時，已經開始嘗試創立女學校，而她一切所學，都是在婚後出於婆母劉璫的啓蒙。以祝宗梁的出身背景，說她婚前完全不識字，不免令人狐疑。然而祝宗梁本人卻也曾就此大做文章，用以吸引女生上學。她在黑龍江第一幼女學校初創，開始招生時，作了這樣的演說辭：

我是河南人士，做女子的時候，不會識字，後來長大料理家事，田契上字也認不得，祖宗牌位上字也認不得，流水帳簿上字也認不得。用錢帖也不知多少，幾筆數合在一起也不會算。我的父親外出給我一信，我也不知說的什麼，又無法寫一回信。活活的比那瞎眼睛的一樣。好不苦呀。我的婆婆，他教我識字。識得三四千個字，都講得寫得。又教我學算帳，筆算珠算，加法減法乘除法，也曉得了。再看看田契，祖宗牌位，都認得了，算算流水帳，也不錯了，寫了七八行平安信寄與我父親，我父親回來一信，我一看就知，我父親升了官了。從此好像瞎子睜眼一般。那時候湖南已開了女學堂，我也去學了些學問，我丈夫到了廣西，我也到廣西走一遭。有個謝淑人邀我做桂林第一女學堂教習，丈夫又蒙程將軍奏調。我兩人同路來，走了十省，足足一萬里路。恰恰有程小姐捐賣妝奩，開辦女學堂，真是難得的好小姐。你們看，欽差大臣的告示也說著要廣立學堂麼。我幼女學校開設在北門大街磚牌樓西胡同第三大門內林公館，專收十二歲以下的幼女，教她識字讀書習算，書籍紙筆學堂預備，每日上點鐘學生在家吃了早飯來上學，三點鐘放學回家晚飯。學堂內有教習教他，回家去有父母教他，自然教成一個好人了。⁵⁹

58 劉璫，〈中國女學師範論〉，《中華婦女界》，卷1號6(1915年6月)，頁2。

59 祝宗梁，〈幼女學校招第一班學生廣告〉(第一幼女學校教習林祝氏演說辭)，引自

在這篇招生演說中，祝宗梁使用設身處地的策略，把未學之前的自己，放在與當地女生一樣的位置上，感受不識字、不能演算在日常生活上造成的痛苦不便，再以自己識字學算後的便利與樂趣，吸引女生上學。簡單的說，祝宗梁採取的方式是爭取認同感以及造成「有為者亦若是」的感受。祝宗梁把女生上學的好處完全放在日常生活的實務上來講述，當然也是針對當地民情的最佳策略。同時，我們注意祝宗梁也強調自己婚前不識字，婚後才受教於婆母，這與林傳甲的說法是相合的。雖然如此，考慮到祝宗梁的演說辭有特定對象（當地人民中潛在的女學生及其家長），有特定目的（吸引女生入學），那麼她的自敘還是有誇張甚至扭曲的可能。

無論祝宗梁婚前是否目不識丁，後來的她卻成為黑龍江女學重要的奠基者。十年之間，她自己創辦了好幾所學校，最後襄助劉璣的黑龍江女子教養院，事實上當時黑龍江省所有創建的女校，多少都與祝宗梁有關係。在黑龍江教學期間，祝宗梁曾選了女生作文百篇，編為《龍江女學文範》，請劉璣逐篇加以評語，然後透過林傳甲的人脈，1910年由商務印書館付核，龍江第一書局發行。⁶⁰可惜此書筆者目前尚未取得。不過，祝宗梁對雜誌界似乎不如劉璣那麼熱情。當劉璣以宗師之姿，頻頻投稿到《婦女雜誌》與《中華婦女界》這兩份新興的婦女刊物時，祝宗梁基本上是保持沈默的。倒是劉璣死後，祝宗梁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還包括整理劉璣的遺著。她之所以發表文章，也或者是為了繼承劉璣以出版言論促進婦女教育的遺志。

然而，祝宗梁留下的少數幾篇文字，卻充滿了強烈的個性，較劉璣毫不遜色。1916年祝宗梁隨夫離開黑龍江，準備轉往蒙古發展，他們首先在北京逗留了一陣子，藉此機會，祝宗梁考察了北京的教育現況，將觀察與感想寫成〈與龍江女弟子論北京女學書〉一文，發表在《婦女雜誌》上。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比較北京與黑龍江教育現狀的優劣，並說

謝嵐等主編，《黑龍江省教育史料選編》（上編），頁355-356。

60 房毅、李鐵漢、董歷仁，〈黑龍江幼女學校的創始人——祝宗梁〉，《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期4（1989），頁80。

明自己離開黑龍江後的計畫，以及對黑龍江的期許。祝宗梁首先驕傲地指出，北京的女學號稱極盛，其實比起黑龍江來也不過爾爾。她的論點是：

鄙人……參觀北京各學校，乃知都中女學雖盛，然以北京丁口二百萬之眾，與卜奎（按：即齊齊哈爾）丁口五萬相較，雖卜奎女教，尚未普及，已有女生千人，則北京應有女生四萬人，合於四十倍之數，始足以稱之。現計京師公私中外各女校，不足三十餘處，學生總數不過六千餘人，僅比卜奎多六倍，雖多而未之多也。

換言之，黑龍江女學在她十年經營下，至少普及率已不輸北京，這自然是可以引以為傲之事。猶記劉璣主張以女子主導小學教育，祝宗梁考察北京時，則注意到京師學務局設之女子中學、各小學，皆以男子為校長，「終不免隔閡也」，⁶¹顯然認為女校應有女校長領導。另一方面，她不得不承認北京師資易得，即使是高小，也有「老翰林教國文，大學生教算學」，程度比黑龍江高出許多。不過，祝宗梁仍認為黑龍江女學在她的帶領下，有勝於北京女學之處。例如她發現：「女子師範中學之體操，究不如卜奎遠甚，且未習槍操，猝聞卜奎女子兵操，若視為最新最奇者。龍江邊壤，其俗尚武，即此一端，亦見軍國民教育精神，足以自豪於各省也。」⁶²一說祝宗梁自幼習武，固然無可證實，不過以此處的言論來看，她的確非常重視體操在婦女教育中的地位，而強調兵操，不但與黑龍江素來的尚武風俗有關，更與時代有關，這與劉璣為「救國」拚死奔走是同一個脈絡。

祝宗梁考察北京教育的另一個重點也與劉璣的教育觀念有關，亦即實用性的問題。簡單地說，祝宗梁對北京的社會風俗與學風都相當失望。她如此觀察：

北京社會奢侈，徵逐最多。第一文酣武嬉，幾以聽戲為正當之

61 祝宗梁，〈與龍江女弟子論北京女學書〉，《婦女雜誌》，卷2號1（1916年2月），「記述門」，頁31-32。

62 同前註，頁33。

功課。……嘗往農業試驗場、中央公園花木繁盛之處，又往東安市場、勸業場商業繁盛之處，皆見游女如雲。若蠶業試驗場、棉業試驗場研究科學之處，惟西人挈挈偕往。中國女子學力不及此，男子學力亦不及此也。武英殿、古物陳列所，有明清景泰藍、珠玉樹之類，游女亦多往觀。雖每人瞻覽費一元，亦所不惜。若交通博物館，陳機械、電線、鐵道、橋樑種（種）標本，則游女不之顧，游士亦不顧也。……嗚呼，中國日趨於空疏，日趨於無用，日趨於奢侈，皆游士游女之究也。⁶³

祝宗梁所列出游士、游女無意觀覽的項目，都是她認為於國家社會「實用」的學問。較諸劉璣純然以「維生」來解釋「實用」，祝宗梁對所謂「實用」或「實學」的認知，誠然較為寬廣，但對「無用」的痛惡，仍然一脈相承。這也很可能與林傳甲對「新知」的多样化興趣有關。值得注意的是，不論祝宗梁、劉璣或林傳甲，他們始終對儒家學說心悅誠服。在討論北京女學時，祝宗梁也建議仿效教會學校週日的祈禱會，安排學生週日參加孔教經書的講演。對他們來說，舊道德與新知識絕對不相矛盾，甚至有助於完成艱難的事業。

事實上，在 1916 年，維護傳統道德與實用價值的祝宗梁，對自己過去與未來的教育事業懷抱著無限的想望。發表對北京女學的觀察以後，祝宗梁宣示了她的教育版圖：

鄙人雖負堅苦卓絕之志，南行不避煙瘴，北行不避冰雪，凡苗蠻峒達呼哩巴爾虎之人，無不可感以赤誠。惟此北京之社會，則明知危亡在旦夕，而酣嬉如故焉。斯則不敢久處，而欲投蒙荒以自奮也。萬里馳書，布告諸弟子，各求實學以自立。則鄙人雖去，而化身千萬，仍在黑龍江上也。……迴憶三間茅屋中，與諸弟子講授伊始，黍稷馨香，菜羹共味，無僕從執役，而諸弟子洒掃必勤，風雪無間。今樓閣高聳，電燈光耀，庶事有員，服勞有媪，龍江進化，已成安樂之鄉，豈忍輕去哉。日

63 同前註，頁 34。

本人福島辭關東都督，曰：若已成事，可讓後賢有經驗者，需另營未成之事業，蓋意在蒙古也。日本人志在蒙古，吾國教育家志不在蒙古，誰與啟蒙乎。今蒙古教育研究會，積極進行，建議事項，多所規劃，雖成不成未可知，然如十年前之黑龍江，豈能夢到今日之進境乎。余是以不辦北京之女學，而愛蒙古之小學。……雖總長三易，吾之宗旨終不易也。⁶⁴

祝宗梁一面批判北京浮靡的風氣，一面回憶自己草創教育的艱辛，最後則將經營蒙古教育的計畫，拉高到國家政策的層次，並且暗示與日本勢力的抗衡。而祝宗梁的雄心還不止於此。在稍後發表的〈與龍江女弟子論察哈爾女學書〉一文中，祝宗梁詳細分析了察哈爾的學校現況，並說明自己逐步創校的計畫。然後她進一步宣示：

余願以十年心力，經營全蒙教育，而後以滿蒙經驗，施之新疆十年，施之青海西藏十年。假我三十年以營國民教育，為眾人所不為，使邊地同於內地，女子之學同於男子，庶幾酬我二十年前之志也。……余亦願以一片血誠，融化冰天雪窖，則蒙以養正，庶幾聖功之始乎！⁶⁵

在此，祝宗梁規劃了自己未來三十年在教育界努力的方向，不但蒙古，更將整個大西北都納入了她的教育事業版圖！

「閨人流血，最易惹人注目」—— 由一篇遊記看施淑儀的人生選擇

劉璣與祝宗梁並非唯一在民國初年的婦女刊物上發聲的女性教育家。若考察當時的雜誌，可發現女校長、女教員與女學生都是重要的供稿者。例如與劉璣一樣時常出現在《婦女雜誌》與《中華婦女界》的范姚蘊素，時任南通女子師範校長，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希望

64 同前註，頁35。

65 祝宗梁，〈與龍江女弟子論察哈爾女學書〉，《婦女雜誌》，卷2號2（1916年2月），「記述門」，頁9-10。

在這裡帶入討論的女教育家則是施淑儀。我在之前的一篇論文中，已經討論過施淑儀在《婦女雜誌》上所發表的若干文字與攝影，以及她編纂《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一書的意義。筆者指出，她一方面熟悉傳統閨秀文化，一方面則傾向新派作風，並且有強烈的展示自我的慾望。她利用雜誌上刊登的文字，為自己塑造了崇尚英雄主義，鄙棄賢妻良母主義，獻身女子教育的鮮明姿態。但另一方面，筆者也強調施淑儀仍然以詩書與宗教為終極的生命歸屬，她之所以傾十年之力，編成《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正是因為自己乃是這個才女傳統的其中一員，而此書映照的是民初閨秀對傳統女性文藝追求的回顧。⁶⁶ 由於施淑儀的例子已經處理過，筆者不擬重覆之前的討論，而將簡短地探索施淑儀的教育事業，以及她在這一過程中發展的自我意識，以與劉璣及祝宗梁的個案作一對照。

施淑儀⁶⁷ (1876-1945)，自號學詩，江蘇崇明（今屬上海）人，父親是光緒年間進士。施淑儀幼從外祖學，也是一位接受閨秀訓練的才女。她曾侍父宦遊大江南北，過名山大川，皆發為詩歌。⁶⁸ 根據流傳的軼事，施淑儀姊妹都是早慧女詩人，幼年時，她的父親曾以「橄欖爽口脆」命對，結果施淑儀對曰：「梅子濺牙酸」，而其妹則對曰：「甘蔗老頭甜」，使得父親激賞不已。⁶⁹ 這種種都顯示施淑儀本來深具傳統才女的情調。她後來與同鄉蔡南平結婚，但丈夫於1904年因憂憤國事而過世，⁷⁰ 施淑儀扶柩回到崇明，自此開始了她的教育事業。

根據資料，自1906年起，施淑儀開始致力開發故鄉的教育。據《崇明縣志》，當地的「尚志女小學」，在城東南慈濟寺，乃光緒32年（1906）由徐應田借袁氏家祠所創設，後來改為公立，仍由徐應田擔任校長，而

66 參見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

67 一作施淑懿。

68 參見陳濂一，《新語林》（上海：上海書店，1997，據1922上海文明書局版重排），頁104。

69 同前註，頁107。

70 參見周之珂編，《崇明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卷35，「人物」，「施淑懿」條。

聘任「蔡施淑儀」為堂長。⁷¹ 這應該是施淑儀投入地方教育事業的起點。到了民國九年八月，施淑儀以縣費一千七百圓開辦了女子師範校，並設附屬小學，⁷² 這則是施淑儀教育事業的顛峰了。同時，民國7年，縣學生祝燮綱以自宅作為基地，創設私立圖書館，斥資購書三萬卷，這時施淑儀也「助書三千餘卷」。⁷³ 可知施淑儀對崇明當地的教育與文化有很大的貢獻。同時，施淑儀一直認同新潮流與新事物，根據資料，在辛亥革命前，她便率先剪去長髮，倡導放足。1906年，她被推為崇明縣放足會會長，之後便開始任教於尚志女學。五四運動期間，她也領著學生上街遊行。甚至在1920年，她還主動到北京參加蔡元培的「國語講習所」，推廣國語。回到家鄉後，施淑儀開始實驗白話新體詩，發表在崇明當地的報紙上。⁷⁴ 筆者尚未取得施淑儀的實驗詩作，深感遺憾，但僅就這些基本資料，已可窺見施淑儀一意求新的決絕態度。

施淑儀長期在尚志女學任教，她也跟劉璣一樣，樂於在各種婦女刊物上發表文章詩詞，不同的是，她的作品並不以介紹自己的教育理念，或者辦學經驗為重點，而往往是以教師身份出發，渲染自己的個人特質。施淑儀於1916年在《中華婦女界》中發表了自己任教十年的紀念詩四首，題作「忝列尚志女學講席已屆十週年賦此以作紀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四首詩分別敘述尚志女學初創之難，學校音樂與體育教育之進步，畢業女生繼續服務於女子教育界等等。其中第二首云：

海鳥頻年未一鳴，九皋霜唳徹霄驚。事經磨劫精神出，人忌清譽謗毀生

初創時外界風潮挫折已非一次。漆室明燈然列炬，扶輪大雅仗羣英

謂外院教員少鴻先生諸人。廣寒新獻上梁賦，勝住瑤臺十二層 戊申春袁氏毀約遷移校舍幸得占穩固地位。

75

71 參見《崇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民國19年刊本)，卷8，頁437。

72 參見《崇明縣志附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民國19年刊本)，卷1，頁1601。

73 同前註，頁1609。

74 參見吳成平編，《上海名人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施淑懿」條，頁279；《崇明縣志》，「施淑懿」條。

75 施淑儀，〈忝列尚志女學講席已屆十週年賦此以作紀念〉，《中華婦女界》，卷2號5(1916年5月)，頁7。

此詩將崇明比作一鳴驚人的海鳥，惟賴教育事業之建立。施淑儀在崇明首開女性任公開教職的先例，在 1906 年當時被當地人視為洪水猛獸，所以才說「初創時外界風潮挫折」。而十年之後，學校教員充裕，校舍齊備，與創校當時已不可同日而語。作者頌揚學校的發展，無異稱美自己的貢獻。正如她在第四首詩中的自評，所謂：「恥將斑管調紅粉，不向紗窗蹙綠蛾。萬古恨天努力補，魯陽我亦誓揮戈。」⁷⁶ 所謂「魯陽戈」，指的是獨力扭轉局勢的力量，自我期許不可謂不高。對筆者來說分外有趣的是，從施淑儀開始辦學，到她在婦女刊物上宣揚功績，時間正好與劉璣及祝宗梁的事業軌跡重疊。這段時間，婦女教育漸形穩固，出版市場活絡，女性在報刊雜誌上愈加活躍，本文處理的三個個案正好具體表現了這些狀況。

雖然同是婦女教育的先驅，也同樣熱心運用報刊媒體，然而施淑儀對所謂「婦德」的觀念卻與崇尚孔教的劉璣及祝宗梁不同。筆者之前已經討論過施淑儀自述自幼接受閩秀教育，內化傳統婦德的價值觀，直到長成後接觸東西哲人的學說，豁然開朗，人生觀為之一變，轉而追求女性個人的成就。而她的女學生也在為她祝壽的文字中，強調施淑儀本人專心讀書，不擅家事，教育女學生也不注重於賢妻良母主義，「意在陶成優美高尚之人才」，並且說她崇拜羅蘭、蘇菲亞、秋瑾等女英雄，相對的，對傳統的賢母形象如班昭、韋母等卻「視之蔑如」。⁷⁷ 此一形象，與劉璣全力護衛的賢母價值，或者祝宗梁一再強調弓操井臼的堅持，差異很大。對於劉璣及祝宗梁來說，賢妻良母與女英雄乃是一而二，二而一，但是對施淑儀來說，兩者卻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選擇與境界。施淑儀的學生指出她崇拜秋瑾，對此她做了很個人性的論述。1914 年，她將自己於光緒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遊西湖的遊記，題為〈西湖日記〉，刊登於包天笑主編的《婦女時報》雜誌上。此文甚長，詳細描述了施淑儀多年來夢想西湖，終於跟學校請假，得以成行，遂由崇明抵達

76 同前註。

77 參見胡曉真，〈文苑、多羅、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

上海，搭火車到嘉興，轉往西湖的過程，然後記錄每天的行程，表達其所見所思，歷史參照，興亡感懷等，當然更隨時記載施淑儀即景所賦的多首詩作。十月初八日，施淑儀來到西泠橋下，憑弔秋瑾墓的遺跡，於是發表了一番感言。她寫道：

西泠橋下，有貞女鄭淑婦墓，其旁即秋瑾女士墓，時已被官吏發掘，片瓦無存。躑躅於斜陽衰草間，不免憑弔一番，默誦「玉肌白刃兩如雪，一笑相從飛碧血」二語，猶想見其臨刑時，折玉摧蘭，牽雲曳雪之慘狀。因念人生在世，既不能無死，死又非常苦楚，賢愚聖盜，終不能免此一關。願死於疾病，與死於國事，所受之痛苦等耳，而太（泰）山鴻毛，其輕重不可以道里計。且閩人流血，最易惹人注目，死狀愈慘，人之惋惜之者愈多，而傳名亦愈永。因歎秋女士之死得其所。追悼一詩云：「扶桑萬里隻身遊，國事馳驅幾度秋。慚愧輸君先一著，英名俠氣動全球。」……余嘗論女子無事不讓男子一步，惟能為國流血者，較男子為便宜。試觀近年來之死於革命者，不下百人，人往往莫能舉其姓氏。獨秋女士之名，昭昭在人耳目，豈非以其女子身耶？……凡吾女同胞，或不幸而步女士後塵者，當以其從容就義為法。⁷⁸

由這段文字看來，施淑儀對秋瑾就義的事蹟，其傾慕之情，自不待言。所謂人皆有死，不如死於國事，成其英雄事業的說法，在當時的情況下也頗為普遍。這裡尤其有趣的應是作者「以性別造英雄」的一番說解。所謂英雄、美人、名士，這三種形象在歷史文化的塑造論述中，往往緊密結合，不可分割。人們渲染秋瑾就義時，冰肌如雪而慘遭刑戮的景象，便是在美人與英雄合體的想像中進行的，對英雄的崇敬與對美人的憐香惜玉之情，已經不能拆開，施淑儀的論述其實也不能脫此脈絡。不過同樣身為女性，施淑儀卻提出了另類思考。她認為女性的身份特別容易引人同情，因此如果女性捨身就義，其效果遠超過男子，而且死狀越慘，

78 施淑儀，〈西湖日記〉，《婦女時報》，期13（1914年4月），頁50-51。

留名越久。根據此一邏輯，施淑儀認為女性若逢難，雖是「不幸」，卻也是「大幸」，因為將比同樣命運的男性更容易成為史上有名的英雄烈士呢。男女的不平等，反而為女英雄加分了——施淑儀的說法，應該說是在烈士死國這件事上，女性可以運用「性別優勢」吧。所以說，在施淑儀看來，女性的成功成名，不能靠傳統婦德，尤其不能搞貞婦烈女這一套，⁷⁹ 必須發自崇高人格，為國家社會轟轟烈烈作一番事業，甚至犧牲生命才行。

然而施淑儀雖然專講英雄主義，卻始終對傳統閨秀文化寄予深情，筆者前已有所申論。她在《婦女雜誌》5卷8號發表自傳詩〈四十自述〉十二首中，其中提到「然脂寫韻」與「忉利華鬢」，堪稱進入中年的施淑儀的兩大人人生方向，前者指編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後者指宗教追求。事實上，她搜輯並整理前代閨秀資料的工作，行之多年，並且陸續發表在婦女刊物上。例如她在《中華婦女界》1卷1期開始便連載《冰魂閣野乘》，2卷4期開始連載《隨園女弟子軼聞》，這些都是後來總纂為《徵略》的前置作業。施淑儀說過，論到人生遠大的志業，「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所以為輕重者，因時代而異其標準」，⁸⁰ 同樣的，女性人生意義之所在，畢竟也是「因時代而異其標準」。施淑儀本來屬於閨秀才女這個群體，她為沒有機會當英雄的前輩留下記錄，寫成「彤史」，正是定義自己在英雄崇拜以外的另一面底蘊。

結 語

本文處理三位投身於清末民初婦女教育家的女性，她們同時也活躍於當時的特定婦女刊物。其中，劉璣與祝宗梁這對婆媳以十年時間共同草創黑龍江女學，可謂生死以之，祝宗梁更誓願獨力開創蒙古、西藏、新疆的婦女教育。她們一家都服膺儒教，在婦女教育的內容上堅持賢妻

79 施淑儀強烈反對烈女殉夫，可參見施淑儀，〈對於烈女殉夫之感言〉，《婦女雜誌》，卷1號8（1915年8月），「論說」，頁5-8。

80 同前註，頁8。

良母主義與實用價值，在婦德問題上態度是傾向保守甚至守舊的。然而她們的立場，是將傳統賢母的力量發揮到無限大，成為救國立民的基礎，因而婦女必須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她們自己的教育志業，便是此一人生理想的實踐。至於施淑儀則終身奉獻於故鄉崇明的婦女教育。她對女性人生境界的想像，頗不同於劉璣與祝宗梁。對施淑儀來說，女性的價值在於自身，不繫於他人，因此妻、母的角色不能定義女人的成就，女性必須求其遠大，奉獻於國家社會。雖然勇往直前地向新女性靠攏，但施淑儀仍能深刻體貼傳統閨秀的生命情調，保全其價值。這兩種典型，同樣出於閨秀階層，一者維護傳統道德，一者追求新興價值，表面上有舊、新之別，但是他們在人生志業上都表現了不畏艱難、創新開展的可敬態度，又豈可僅僅以舊女性、新女性的標籤予以簡化呢！

這三個個案也提供我們思考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劉璣、祝宗梁與施淑儀都積極將自己的文稿刊載於婦女刊物上，其中固然有不少舊體詩詞，但更多的是以散文行文的論說文。明清女性文藝以韻文為主，詩詞、戲曲、彈詞小說等都在廣義的韻文範圍內。相較而言，散文的數量在比例上就少得多了。然而在20世紀初，女性的寫作明顯開始向散文轉向，由報刊雜誌的資料來看，雖然詩詞發表仍舊延續，但是以女校長、女教師、女學生的身份投稿者，其作品多是議論文與記敘文，甚至還出現同校女生集體投稿的現象，而這與國文教育必有一定關係。例如，錢基博在女子中學任教時，便曾在《婦女雜誌》刊登〈吳江麗則女中學國文教授宣言書〉一文，宣稱要嚴格督促學生學習諸體文字，並將成果按期刊登在《婦女雜誌》上，⁸¹ 實施數期後，因為遭到其他讀者批評為壟斷版面而告終。由此可見，劉璣等女教師積極發表議論文，也同樣應該放在這個女性寫作轉型與國文教育的脈絡裡來理解。同時，施淑儀選擇將自己遊西湖的日記舊稿發表，也是類似的情況。當時的報刊雜誌陸續刊登女性的遊記，遊歷還成為女學生作文推廣的一種觀念，遊記的數量很多，遊歷的地點也由近郊擴及遠方，這本身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81 錢基博，〈吳江麗則女中學國文教授宣言書〉，《婦女雜誌》，卷1號11（1915年11月），「論說」，頁1-3。

總之，劉璣、祝宗梁與施淑儀確實繼承了晚清以來女子在報刊發表議論的傳統，進一步轉化且擴展了女性文藝。尤其，她們的文字不但在普遍意義上議論女學，更往往突出自己的學養、貢獻與生命高度。換言之，在報刊雜誌上發表言論，成為 20 世紀初知識女性自我形塑的重要方式。

徵引書目

一、民初雜誌資料

- 林傳甲，〈錫善堂教子記〉，《中華婦女界》，卷2號4(1916年4月)，「文藝」，頁12。
- 林德育，〈京師白雲觀遊記〉，《婦女雜誌》，卷3號4(1917年4月)，「記述門」，頁5。
- 施淑儀，〈西湖日記〉，《婦女時報》，期13(1914年4月)，頁50-51。
- 施淑儀，〈忝列尚志女學講席已屆十週年賦此以作紀念〉，《中華婦女界》，卷2號5(1916年5月)，頁7。
- 施淑儀，〈對於烈女殉夫之感言〉，《婦女雜誌》，卷1號8(1915年8月)，「論說」，頁5-8。
- 祝宗梁，〈與龍江女弟子論北京女學書〉，《婦女雜誌》，卷2號1(1916年2月)，「記述門」，頁31-32。
- 祝宗梁，〈與龍江女弟子論察哈爾女學書〉，《婦女雜誌》，卷2號2(1916年2月)，「記述門」，頁9-10。
- 祝宗梁，〈續孟軒說經粹語〉，《婦女雜誌》，卷3號4(1917年4月)，頁18。
- 劉璣，〈女子教育宜謀經濟獨立策〉，《婦女雜誌》，卷1號2(1915年2月)，「論說」欄，頁12-14。
- 劉璣，〈中國女學師範論〉，《中華婦女界》，卷1號6(1915年6月)，頁2。
- 劉璣，〈中華婦女之生計〉，《中華婦女界》，卷1號4(1915年4月)，頁2-3。
- 劉璣，〈中華婦女之移殖觀〉，《中華婦女界》，卷1號5(1915年5月)，頁1-4。
- 劉璣，〈中華婦女之責任〉，《中華婦女界》，卷1號3(1915年3月)，頁1。
- 劉璣，〈中華婦女界祝辭〉，《中華婦女界》，卷1號1(1915年1月)，頁1。
- 劉璣，〈林下詩存〉，《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文苑」，頁6。
- 劉璣，〈林典史誄〉，《中華婦女界》，卷1號6(1915年6月)，頁6-7。

- 劉璣，〈婦女迷信宗教與道德關係〉，《婦女雜誌》，卷1號4(1915年4月)，「論說」，頁7-9。
- 劉璣，〈發刊辭二〉，《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頁2-4。
-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文告章程一束〉，《婦女雜誌》，卷1號1(1915年1月)，「紀載」，頁3。
- 劉璣，〈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成立狀況〉，《婦女雜誌》，卷1號3(1915年3月)，「紀載」，頁3-10。
- 劉璣，〈黑龍江救國儲金團演說書〉，《婦女雜誌》，卷1號9(1915年9月)，「紀載」，頁1-3。
- 劉璣，〈義務教育責在婦女議〉，《婦女雜誌》，卷1號6(1915年6月)，「女學商榷」，頁5。
- 錢基博，〈吳江麗則女中學國文教授宣言書〉，《婦女雜誌》，卷1號11(1915年11月)，「論說」，頁1-3。

二、專書

- 《崇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崇明縣志附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黑龍江省志·人物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
- 王天興、王亞興、王宗虞編，《河南歷代名人辭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吳成平編，《上海名人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 杜貴墀，《巴陵人物志》，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冊29。上海：上海書店，1994。
- 汪佩偉，《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
- 周之珂編，《崇明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林正秋主編，《中國地方志名家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
- 姜樹卿、單雪麗主編，《黑龍江教育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 陳平原，《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陳國球，《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 陳瀛一，《新語林》。上海：上海書店，1997。
-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黑龍江志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 蕭乾，《黑土金沙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謝嵐等主編，《黑龍江省教育史料選編》。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ann, Susa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三、論文

- 王延華，《鶴城晚報》，2006年10月27日，版12，「卜奎人物」欄。
- 李文炳、王洪生、范佩卿，〈教育家林傳甲傳略〉，《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期1(1989)，頁93-97。
- 房毅、李鐵漢、董歷仁，〈黑龍江幼年學校的創始人——祝宗梁〉，《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期4(1989)，頁80。
-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95-218。
- 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陳國球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 陳東玲，〈朱慶瀾興辦省女子教養院〉，《黑龍江史志》，期3(1992年6月)，頁51。
- 賀俊杰，〈1915-1916年救國儲金運動結局述略〉，《民國檔案》，2006年2月，頁74-80。

-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29-134.
- Judge, Joan.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 3 (June 2001), pp. 765-803.
- Widmer, Ellen.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an Writer,"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93-225.

Educators and Writers: The Two Faces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Women

Siao-chen 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look at how women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worked as educators tried to incorporate the emerging new forms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into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 propose to deal with three cases in this article. The three women were all active in the 1910s; they worked as teachers whil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writing and publishing. However, they were different in their definitions of women's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ings of women's literary career. While it is oversimplifying to locate them into the conservative and the progressive camps respectively, the three cases, if considered as two type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how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ducated women created self-images and defined themselves.

The first two cases in discussion are Liu Sheng and Zhu Zongliang, a mother-in-law and her daughter-in-law, who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women's education and cooperated to found the first women's school in Heilongjiang. During their stay in Heilongjiang, Liu and Zhu published many works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in magazines, presenting themselves as model mothers and pioneering educators. The third case is Shu Shuyi. After her husband and son died, Shi founded a women's school in her hometown Chongming. Like Liu and Zhu, Shi published many works in magazines and always emphasized her status as a teacher. On the other hand, she created for herself a striking image by cutting hair short, joining political rallies, going to Beijing to learn *guoyu* (Mandarin), and experimenting on composing modern poetry. Shi tried to define herself as an enlightened woman who had forsaken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for women and were heading toward the future. The three women were all writers and teachers at the same time, yet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visions of women's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 Words: women's education, *Funü zazhi*, *Zhonghua funüjie*, Liu Sheng, Zhu Zongliang, Shi Shuyi